

《农业四十条》在农村的传播与执行情况分析

——基于浙江省海宁县的基层档案与调查材料

席富群*

【摘要】《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下简称《农业四十条》)是农业集体化时代毛泽东领导制订的引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这一公共政策在农村的具体传播与执行情况进行梳理和研究,对了解历史、戒鉴现实和丰富学术都有一定的意义。《农业四十条》在农村的传播、讨论方式及途径,反映了国家话语对民间表达的借用及国家权力与村庄权利的关系;而《农业四十条》在基层执行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则可纠正学术界既往对有关问题认识方面存在的偏差。

【关键词】《农业四十条》;农村;传播;讨论;执行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5-0036-07

《农业四十条》是农业集体化时代引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其制订和修正经历了1955年秋的酝酿、1956年初草案公布、1957年秋修正草案公布、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二次修正草案、1960年4月二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二次修正案等较长的过程,而其引领和指导作用则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夕。因此,对这一典型而影响长久的公共政策在农村的传播与执行情况进行研究,无论是对既往历史的梳理,还是对学术界有关《农业四十条》得失的争论以及对现实的借鉴,都有一定的意义。本文的分析案例海宁县地处浙北平原,是《农业四十条》规定的第三类——追求亩产指标800斤的地区。笔者因做博士后时长期在那里做田野调查,积累了比较多的基层档案和文书材料,并做过许多访谈工作,是为本文撰写的基础。

一、《农业四十条》 在海宁农村的传播情况

《农业四十条》是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酝酿诞生的。它是以生产关系变革推动生产力发展思想的结果,也是农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中央要求全面改变农村面貌的纲领性文件。其主要内容是在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

争取从1956到1967年的12年内,粮食的每亩平均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棉花的亩产在上述三类地区分别达到60斤、80斤和100斤;同时鼓励多种经营,对其它农作物、蔬菜和经济作物的发展也提出了要求;还要求各地分别储蓄足够一年、一年半或者两年的余粮。文件的核心内容是“四、五、八”指标。为保证这些指标的实现,《农业四十条》还提出了后来被提炼为“农业八字宪法”的一系列增产措施。另外,对农村生产生活的改善、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交通通讯的发展、商业网点的布局、养老及妇女儿童的保护等,都做出了全面的规划。因此,《农业四十条》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蓝图。

《农业四十条》在1956年初公布后,农村已经开始布置传播。在1956年3月盐官镇党委在给县委的一份宣传汇报材料中显示,当时宣传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以及“一五计划”提前完成的成就。其中也有《农业四十条》(草案)的内容,并规定着重宣传《农业四十条》中的第六、第七和第

* 作者简介:席富群,河南洛阳人,(苏州215123)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四十条——即农业产量指标、粮食储蓄任务和工农联盟对完成《农业四十条》的重要性。^① 传播的渠道，除了官方布置的标语、口号、横幅、墙报外，主要是专业宣传队和被动员起来的民间艺人和中小学生，他们用各种文艺形式在街头、茶馆、高级社进行宣传。

对《农业四十条》的大规模传播开始于1957年秋天。1956年初公布的草案，经过各级组织一年多的学习、讨论和修改后形成的修正草案于1957年10月25日公开发表，《人民日报》同时配发社论，要求全民学习讨论，由此掀起一个农村生产高潮。^②

通过科层制以会议和文件的形式逐层传播是毛泽东时代最主要的传播渠道和方式。海宁县所属的嘉兴地委在通过召开各县有关领导人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进行详细的安排后，于12月初制定了一份详细的《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宣传参考资料》。文件规定了宣传内容要围绕三大方面进行：（一）发展农业的重大意义：1. 农业发展的快慢和工业发展的快慢及国民经济发展的快慢有重大关系；2. 我国是个有6亿人口5亿农民的大国，人口增长快，对粮食的需要增长快，不发展农业就无法满足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3. 我国广大农村不仅是轻工业的主要市场，也是重工业的主要市场，农业的发展可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二）《农业四十条》所规定的指标是完全能够实现的：1. 《农业四十条》规定的指标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凭空想象的；2. 实现《农业四十条》规定的指标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打下的基础、农业合作化完成成为生产力开辟了发展空间、有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群众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的提高；3. 要靠自力更生来完成《农业四十条》规定的任务：要不断批判右倾保守和个人主义思想促干劲；要以“愚公移山”和“开山劈岭”的精神向自然要粮食，不要片面地依赖政府；各行各业要协作和支援农业，特别是工业和知识界要提供物质和技术的支持。

县级及以下单位按照地委的布置于1957年11月初就掀起了学习和宣传《农业四十条》的高潮。11月13日，县委传播部发文要求农村、工厂、机关、企业、事业、部队、学校、街道、统

战部下属的各民主党派都要展开大规模的学习和讨论。农村的学习和讨论要以大队或者小队为单位，领导负责，对《农业四十条》内容逐条学习、讨论和领会。^③

与海宁县宣传部在体制内通过层层会议和文件面向精英传播《农业四十条》内容和精神这一严肃的主渠道不同，县文化馆的传播是面向大众的，其传播方式更加丰富生动。用民间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人源自战争年代的一大传统。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全社会的高度政治化和极高的政治动员程度，民间文学艺术作为政治传播工具的特点十分鲜明。海宁县文化馆在1957年底制定了宣传《农业四十条》的详细计划，其内容包括“总体要求”、“宣传内容”、“各项活动的指标”和“主要措施”等。^④ 这个传播计划的大小目加起来几十条，从要求到内容、从步骤到措施，都很全面和具体。但就是这个计划，上报嘉兴地委后，被认为存在两个需要修改的方面：一是如何服务于“四十条”，从形式到内容还不够具体；二是如何利用春节期间的民间活动把“四十条”的宣传推向高潮，措施不够有力。^⑤

对《农业四十条》的传播是全民动员式的，据资料显示，无论是正式的、业余的文化组织和文化工作者还是民间艺人，甚至是学校的学生都要投入传播活动中。传播的受众是广大民众。传播的主要方式是展览、说唱、演戏和黑板报等。展览以图片为主，配以模型，在各级、各界、各行业的会议和集会包括群众性集会的地方都要进行；说唱要在街头、集镇、茶馆、合作社的生产小组进行；农村剧团要按照“四十条”内容编排

① 《盐官镇1956年2月宣传总结汇报》，海宁档案馆馆藏案宗。

② 《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第1版。

③ 《关于开展全民讨论“1956到1967年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通知》，中共海宁县宣传部1957年11月13日发文，海宁档案馆馆藏。

④ 《海宁县文化馆开展“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宣传工作计划》，1957年11月30日，海宁档案馆馆藏。

⑤ 《嘉兴地委宣传部对海宁县文化馆开展“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宣传工作计划的批示》，海宁档案馆馆藏。

现代戏,深入社员中间宣传;黑板报要在各单位和居民区以及村庄随处可见,农村生产小队也要保证都能读到黑板报的材料。另外,电影院要安排专场宣传,广播站要教“四十条”的歌曲并组织歌咏比赛,美术工作者要绘制图画,业余作者要编写剧本和说唱材料。传播工作还要进行试点推面、巡回检查督导的方式保证数量和质量。^①在海宁档案馆,还藏有当年宣传中央政策的民间《俱乐部资料》和《海宁说唱》两种小册子,其中就有不少关于宣传“四十条”的内容,如《实现“四十条”意义真勿小》(银纹丝调)、《“纲要”红旗举得高》(夜夜游)、《海宁实现“四十条”,五件大事要抓牢》(越剧唱词)、《为了实现“四十条”》(对口词)、《实现纲要“四十条”,有利条件木佬佬^②》(打莲湘或者八段景调)等。

在通讯事业不发达而国家治理又政治运动化的年代里,把中央的政策传播到民众中间是一项艰巨的、经常化的任务。体制内的精英可以通过会议和文件传达,而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的普通民众,国家话语的表述必须借助民间能接受的形式,特别是民众喜欢的地方文艺形式。这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更是官方与民间的互动,是真正的大众化和接地气。

二、《农业四十条》 在农村执行过程中的两次讨论

《农业四十条》在执行的过程中,曾引发过农村的两次大讨论:一次是公布之初,民众普遍盲目狂热;另一次是“大跃进”高潮过后,民众特别是农民表现得比较审慎冷静。民众在后一次讨论中的表现态度很好地阐述了恩格斯的话:“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③

实际上,1956年初《农业四十条》草案公布后,中央曾经要求各地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但由于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反冒进,草案因被认为某些指标过高而被冷置不提了。1957年夏秋之后,在整风反右运动的基础上,毛泽东开始反对党内的右倾保守思想,进行反“反冒进”。

四十条草案被修改后于1957年10月25日公布。同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队新高潮》的社论。

中央发动的第一次大讨论,由于是在反对右倾保守、反对“爬行”思想、反击认为《农业四十条》草案冒进思想的背景下展开的,所以讨论实质上就是表态,即支持和拥护修正案^④,列举实现修正案的有利条件,反击怀疑、消极和保守的态度。这从海宁县委宣传部向各级组织和单位、各行各业各界发出的大讨论的通知中可以看出。在组织讨论的“要求”中,文件主要规定了三条:(1)明确四十条内容,认清方向,人人努力,改造中国;(2)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修改意见;(3)通过讨论,结合当前工作和生产,检查对照一下本单位和个人为实现四十条能做些什么、怎样为发展农业出一份力。从而在农村制订生产规划,掀起冬季生产热潮,开展大规模的积肥和兴修水利运动,为争取1958年的大丰收做好准备。在机关,首先是整顿好作风,面向农村。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提下,规划本单位工作和考虑自己应该做些什么。^⑤

这一讨论在农村最基层直接变成了表态和报数字运动。海宁县有个三星乡,乡党委书记召开大会时提出要提前实现《农业四十条》,并提出了1958年内达到“每户猪羊有8头,每亩粮食800斤,每亩地积肥(河泥)800担,每户收入800元”^⑥的目标。他要求各农业社展开挑战和应战,纷纷表示决心、报数字。一个姓蔡的生产

① 《海宁县文化馆开展“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宣传工作计划》,1957年11月30日,海宁县档案馆藏。

② 木佬佬,是吴语方言,意思是很多。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2页。

④ 《纲要》的修正草案和第二次修正草案内容调整不大。修正草案主要是在增产措施中加入了“密植”一条内容;第二次修正案主要是对“除四害”中的“四害”之一的麻雀换成了蟑螂。

⑤ 《关于开展全民讨论“1956到1967年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通知》,中共海宁县委宣传部1957年11月13日发文,海宁县档案馆藏。

⑥ 胡少祥日记,2004年4月9日。这些数字原本是嘉兴地委制订的12年规划的指标,乡领导要求一年内完成。

队长说“这几天，我给你们弄得像腾云驾雾一样。我如果实事求是讲，你们要说我保守右倾，不实事求是讲吧，到我胡子满把抓也办不到。”^①这话被当做“活思想”^②的典型记录在案。另一位姓王的队长回忆说：当时浮夸风很严重，不愿意虚报数字的就会被整风；整风主要是批评教育，开会时留下来不让回家，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回家。^③

在不断整风反右的氛围中，在大规模积肥和兴修水利的运动中，逐渐形成了这样的逻辑：上面任务压顶，下面虚报浮夸；下面虚报，上面认为余地更大，指标层层追加；上面任务加大，下面更大浮夸。上下互动，恶性循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大跃进的亢奋状态。

关于《农业四十条》的第二次讨论发生在1961年秋天，即人民公社制度和大跃进政策刚开始调整时期。大跃进和大公社制度造成的严重困难，经过1960年的“农业十二条”和1961年的《农业六十条》政策的落实，遏制和扭转了“五风”现象，恢复了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市场，确立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体制，落实了“三包一奖”制度，取消了集体食堂和供给制度，农村开始恢复生机和活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四十条》确定的目标被重新提起。按照1960年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农业四十条》（第二次修正案）时中央提出的建议——“建议大会号召全体农民和全国人民为提前两年或三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努力奋斗”^④，海宁县在这次动员农民提前实现《农业四十条》时，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在全县范围内声势浩大地宣传动员，而是由县委和公社党委派出工作队到生产条件较好的一类队^⑤去蹲点，组织社员学习，围绕《农业四十条》“要不要提前实现”、“能不能提前实现”、“如何提前实现”展开讨论。工作人员引导社员分析提前实现纲要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统一思想认识，找到粮食增产的办法。根据资料显示，这次上面要求达到的指标在基层不再被狂热地提高，而是遭到了社员特别是生产大队和小队干部不同程度的怀疑，说明农民在经历了严重困难之后开始变得冷静、理性和务实。

被选作试点的大队所在公社的党委都把各大队讨论提前实现《农业四十条》的情况向县委做

了详细的书面汇报。汇报资料虽然都反映通过反复学习和教育，打通了社员的思想，最后都表示提前完成《农业四十条》的决心，但其中的“思想斗争”却相当复杂尖锐。据当时丰士、黄湾和马桥三个公社的材料反映，面对上面布置的提前完成《农业四十条》任务，从村干部到社员普遍的态度是这样的：（1）认为“五风”又刮起来了。农民认为粮食产量800斤的任务就是国家又想多征购粮食，政策又要变了。材料反映说农民有四怕：一怕“三包”政策变；二怕多征购；三怕支援灾区；四怕“一平二调”。有些人甚至悲观地认为，政策今年不变明年变，反正没有安稳日子过。^⑥（2）消极为难。面对亩产800斤的任务，干部群众纷纷摆困难：劳力少、农具缺、没肥料等，认为除非工业能支援肥料和农药，否则很难完成任务，甚至认为农业靠人干也得靠天，不该事先订出指标来。^⑦（3）对订出的指标表示怀疑。比如，黄湾公社群乐大队在上面派出的蹲点干部主持下订出1962年粮食亩产900斤的指标后，有社员说：生产搞的好，是高兴，实现了900斤，明年饭蓝挂在帐杆上，日里吃夜里吃也吃不光；如果政策变，老鼠咬断饭蓝绳，生产搞的好，大家也吃不成。^⑧

由于刚刚经历了严重的灾难，特别是中央大力纠正强迫命令作风，干部们面对社员干部的怀疑、消极为难情绪，也表现得相当宽容、温和和有耐心。他们反复给社员干部解释“四十条”与“六十条”的关系、生产指标与包产指标的关系、切合实际的指标与浮夸风的分界线、“三包”内

① 《三星乡社会主义齐心大会汇报》，1958年1月，海宁县档案馆藏。

② “活思想”是指不合时宜的消极、落后思想。

③ 王张堂访谈资料，2009年3月26日。

④ 谭震林《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60年第13期。

⑤ 人民公社时代，无论是人还是组织，总是按照“左”、“中”、“右”的思路进行划分。生产队往往按照生产条件和发展水平被划分为三类，其中一类是条件最好的。

⑥ 《马桥公社新民大队贯彻农业纲要四十条情况总结》，1961年10月26日，海宁县档案馆藏。

⑦ 《丰士公社长和大队800斤搞点情况汇报》，1961年11月2日，海宁档案馆藏。

⑧ 《黄湾公社群乐大队关于贯彻提前实现四十条的试点情况》，1961年11月6日，海宁档案馆藏。

粮食与超产粮的关系、国家任务与超产增购的界限等,帮助农民正确认识和理解国家政策,鼓励农民走出困难重拾信心。总之,这次讨论中代表国家力量的干部与农民之间表现出了与之前不同的关系,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互动。

三、《农业四十条》 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引领作用

1961年秋,对提前实现《农业四十条》进行讨论之后,随着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深入和全党对大跃进造成的农业破坏的严重性的认识,特别是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农业四十条》暂时不讲^①之后到1964年前,从上到下不再讲“达纲要”的事情了。从1964年起,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三五计划”要开始执行了,《农业四十条》又被重新提起。海宁县在1965年对《农业四十条》执行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形成了70页的文字,包括“执行情况”、“存在问题和意见”两大部分。从文件可以看出,全县农业和农村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除了粮食的平均产量在1963年实现了《农业四十条》规定的800斤指标外,其它方面的指标基本都没有达到。而且,粮食的生产也存在着不平衡现象:“全县还有一个公社、三十个大队、七百三十八个生产队、五万四千八百九十亩粮田的亩产量没有达到八百斤的纲要指标,占粮田总面积的百分之十六点三。”^②之后的岁月里,全县农村一直以《农业四十条》规定的指标为奋斗方向。70年代初,绝大部分公社、大队都完成指标后,县委又提出了“跨纲要”、“达双纲”的任务,并始终认真贯彻“八字宪法”。《农业四十条》在农村的引领作用一直持续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从三星公社联民大队一位干部的工作日记^③里就可窥其一斑。下面摘出日记里的相关文字证明:

1965年11月,出席新星大队在三里港加工厂的会议。公社沈书记报告:当前生产为明年第三个五年计划打好基础,为实现农业纲要40条作出贡献。

1968年12月15—18日,出席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在云龙大队),明年的任务,是贯彻以

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全面发展的总方针……奋斗目标是全省要求达到农业纲要,实现800斤。

1970年11月23日,出席公社会议1天。李书记传达关于当前工作问题……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②深入开展二条路线的斗争。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同时批评右倾保守思想,就是懦夫懒汉思想。我们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③加速(实现)农业发展农业纲要40条,尽量减少吃国家粮。苦下工夫搞土地基本建本,农田基(本)建设,全面考虑农业八字宪法,实现毛主席提出4—5年计划现实农业机械化。

1971年3月23日到26日,出席公社四好五好积代会会议纪要:总结大好形势——连年来粮食增产,超了农业纲要。当前春花生长良好,积肥推向高潮。连续6年超纲要,其中5年超了千斤……26日下午听报告,李书记传达县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胜利。农业生产连续九年丰收,1970年北京、浙江等三个省连续2年超纲要……公社根据县委精神提出要求:71年是国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更大跃进的一年,要坚持以粮为纲、大办农业、狠抓夺粮、全面发展的方针。主攻方向:猛攻单产,全面落实“八字”宪法。

1972年8月2—4日,公社陈福才同志传达县永福会议精神:早稻丰收,每个公社出现4—5个生产队超纲要,每个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要总结一下,为秋耕丰收打下基础。

1972年9月11日,参观杭州市郊红旗人民

① 刘少奇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特别是四、五、八,照现在这样算起来,到1967年达不到四十条那样的标准。四、五、八,恐怕原来提出的时候调查研究也不是那么充分,所有的土地都达到400斤、500斤、800斤,这个问题,还需要再去进行调查研究《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我们现在不提,但是不取消。12年做不到,加几年就是了。

② 《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执行情况》,1965年9月,海宁县档案馆藏。

③ 联民大队副书记周生康,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把每天的日常工作都记下来,积累了200多万字的《周生康日记》。这套日记即将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公社。红向阳大队的络麻移栽是六六年搞的亩产已600多斤……迟麻变早麻，低产改高产。去年三个队超纲要，省种、省工、省肥料、省成本。

1973年3月18日，参加县水利工作会议。上午听报告。朱秉林同志总结前段水利情况，提出今后工作意见。他说，全县办了电灌以来，促进了农业生产高产丰收。63年超纲要，66年超1000斤，72年1282斤……今后农业要在两三年内粮食超“双纲”，我们水利部分怎么办？不能消极畏难，等待依赖，无所作为，不能辜负党的期望，也不能忘了全县人民重托。

1973年9月9—10日，参加县信用合作社代表会议。许家来同志讲这次会议的意义：是县委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是根据县委提出全县在二三年粮食双跨纲要要求，信用社要支援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支援机械化发展。

1974年3月3日，参加县农业八字宪法经验交流会纪要。上午听报告。孙才江同志说：这次会议是县委指示召开的，是总结交流73年度抓大事促大干，落实农业八字宪法经验交流，是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号召，为74年落实农业八字宪法，实现全县在二三年双跨纲要而奋斗……会上先进大队介绍经验，表示“双跨”决心。

1975年1月7号上午，听先进单位介绍经验。吴兴县禾场公社鲍山大队……1973超纲要，大幅度增产，74年超1000斤。

1976年9月5日，参加公社召开的大队正副书记、站长会议纪要。赵荣华书记传达县会议精神，总结全县农业生产的形势大好。全县春粮比去年增1400多万斤。早稻预计单产600多斤，总产2000多万斤。出现四个公社超纲要：章江、长安、许村、钱塘江。出现超1000斤大队。而当前晚稻生长良好，又丰收在望。

1977年10月1—2日，在大队召开冬种学习班上发言摘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进一步落实“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认真落实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坚持多种，调整茬口；坚持自力更生，抗灾夺丰收；坚持科学种田，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狠抓基础，猛攻单产，力争春粮、油菜总产超历史，单产翻一翻，为实现全

县早稻亩产超纲要、络麻亩产超700斤创造条件，为实现华主席指出抓纲治国战略决策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而努力奋斗。

1978年3月12日，在大队召开生产队队务委员、科技“五员”参加的会议。讲话摘要：（1）今年任务和大好形势；（2）早稻亩产超纲要技术意见。

1979年2月13日上午，在红卫丝厂礼堂听报告。这次会议主要是学习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公报、二个重要文件^①和有关文件。会议安排大体10天……17号在“新华农场”听工作报告。马汉民同志讲工作重心转移问题和四个现代化问题，首先要求把农业现代化搞上去……他要求确保79年粮食亩产（双季）1700斤……棉花亩产超100，上纲要。

1980年6月10日，参加公社召开的正副书记会议。荣华同志传达地区会议精神。主要内容：如何把早稻培育促早发高产和晚稻如何争季节，研究育壮秧。他要求：千方百计把晚稻生产搞上去是粮食生产大头，全县占42%，指标770斤，争取上纲要。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摘录和罗列这些关于“达纲要”、“超纲要”、“跨双纲”的文字记载，是为了说明以下问题：第一，《农业四十条》并非像有些研究者所说因为是发动大跃进的纲领性文件，所以在纠正大跃进错误时被否定了，以后就销声匿迹了。它确实在七千人大会上被反思过，刘少奇只是说暂时不讲，以后可延长其实现的时间。事实上，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结束后，它很快又成为农业增产追求的目标，成为引领农民奋斗的旗帜。即使在“文革”岁月里，除了1966、1967年的严重动乱外，农民仍然按部就班地生产和劳作，维持着乡村的秩序，因为“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不种地就没饭吃，而有饭吃才能活着。这是农民的最大理性和第一逻辑。“文革”时的某些涉农政策影响了农业产出和农民受益，而农民并没有因“革命”减少对土地的付

^①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反映了中央为了把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搞上去而对传统农村政策的初步变革。后一个文件是俗称的“农业六十条”的第四个版本，也被称作“新六十条”。

出。第二,《农业四十条》的确对农业大跃进的出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者说大跃进的导火线。但四十条规定的指标并不是盲目的空想,它和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放卫星性质完全不同。大跃进的发动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并不是《农业四十条》促成的,相反,《农业四十条》却因为大跃进的冲击而一度中断正常执行。《农业四十条》在制定和修改的四年多时间里,最初规定的粮食指标并没有变化,而且经历大跃进冲击后仍然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提前实现了。本文所讲的海宁县就是1963年基本实现了四十条规定的粮食指标的,70年代初一些地方的粮食产量已经是四十条规定的两倍了。第三,从《农业四十条》衍生出来的农业“八字宪法”一直被农民奉为粮

食等农作物增产的根本保障。县里和公社经常召开发展农业的经验交流会,“八字宪法”无疑是最根本的法宝。《周生康日记》记载了各级会议上领导对增产措施的布置和安排,土壤改良、增加积肥量、水利灌溉、育种和改良品种、植物病虫害防治和田间管理都是逢会必强调的内容,农民的日常生产始终在围绕着这些内容劳作。在工业无法满足农业所需的生产资料的岁月里,“达纲”、“超纲”和“跨双纲”的亩产数字背后,是农民的辛勤付出和艰苦劳作。

(责任编辑 欣 彦)

(上接第29页)

概念来言说。上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道主义的阐述,其文本语境是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此这里我们将其暂时理解为与“人本主义”一词具有共同的含义,即指人类的主体性地位。自然主义从自然的存在、发展出发来反观人类的活动,人本主义则以人的利益为优先考虑原则来与自然相处,对两者孰轻孰重的思考稍不留意就会陷入某一个极端:或者自然中心主义,或者人类中心主义。主张自然中心主义即将人类等同于宇宙万物,放弃人类尺度,主张人类中心主义则将人的利益诉求作为唯一的价值标准而丝毫不顾及自然的存在状况,从含义本身就可以看出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各自的弊端。我国的绿色发展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实现自然与人类的“双赢”,即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统一,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一方面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

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依据美的原则再生产出整个自然界,创造出更加美丽、美好的人化自然图景,实现人与自然基于高级形态文明基础之上的和谐相处;另一方面我们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要考虑到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美化自然,坚持以绿色发展的理念来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坚持从历时态的角度来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充分意识到一个生态良好的自然环境是我们这一代人与无数子孙后代共同的家园。

综上所述,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及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对我国在现阶段实施绿色发展理念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责任编辑 林 中)